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色诺芬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施特劳斯 科耶夫 ● 著

论僭政

——色诺芬《希耶罗》义疏

On Tyranny

古热维奇 罗兹 ● 编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色诺芬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论僭政

——色诺芬《希耶罗》义疏

On Tyranny

施特劳斯/科耶夫 | 著

古热维奇/罗兹 | 编

何地 | 译

观溪 | 校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美)施特劳斯等著;何地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

(经典与解释)

ISBN 7-5080-3865-7

I. 论… II. ①施… ②何… III. 色诺芬(约前430~前354)
—哲学思想—研究 IV. B50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7886号

On Tyranny © 1961, 1991, 2000 by the Estate of Leo Strauss.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2-4573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版 次: 2006年1月北京第1版

200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13

字 数: 338千字

定 价: 3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疏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

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於北京

“色诺芬注疏集” 出版说明

色诺芬 (Xenophon, 约公元前 430 - 350) 是古希腊伟大的著作家, 苏格拉底的两位最善于通过写作从事文教的学生之一, 传下的著作体裁多样: 有史称西方自传体小说开山之作的《居鲁士远征记》、承续修昔底德笔法而修的史书《希腊志》、长篇政治教育小说《居鲁士劝学录》、以苏格拉底为作品形象的“苏格拉底文学”四篇和若干主题广泛的短篇著作 (如《斯巴达政制》、《雅典的收入》、《希耶罗王》、《阿格西劳王》、《骑术》、《狩猎术》等等)。

早在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时期, 色诺芬就获得了无可争议的古希腊经典作家、思想权威的名位 (参见 K. Münscher, *Xenophon in der griechische - römischen Literatur*, Leipzig 1920), 其著作因内容涉猎广泛、文笔质朴清新, 从古至今一直是古典语文学的基础性范本。锡德尼在说到历史上的史书大家 (希罗多德、李维) 的笔法时留给我们这样一句话:

色诺芬卓越地虚构了另一个这种计谋, 它是由阿巴拉达塔斯为居鲁士做的。我很愿意知道, 如果你有机会用这样的正当的欺蒙来为你的君王服务, 你为什么不同样地向色诺芬的虚构学习, 而偏偏要向别人的真实学习呢? 事实上, 向色诺芬学习还要好些, 因为这样可以保住鼻子。(锡德尼, 《为诗一辩》, 钱学熙译, 人民文学版 1964, 页 26)

自笛卡儿—康德—黑格尔以来，“形而上学”在西方文教制度中逐渐僭取了支配地位，色诺芬因不谈“形而上学”逐渐被冷落，不再被看作地位很高的古希腊经典作家（取而代之的是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人）——汉语文教界与西方文教制度接棒时，接手的是以现代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跟着西方的形而上学后代对色诺芬视而不见。

在恢复古典的自由教育风气影响下，晚近二十年来，西方学界整理、注疏、读解色诺芬著作又蔚然成风，成就可观。“色诺芬注疏集”乃汉译色诺芬著作全编，广采西方学界晚近相关成果，不拘形式（或采义疏体专著、或编译笺注体译本、或汇集各类义疏），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于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和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全新发展。

刘小枫 甘阳

2004年11月

中译本说明

在二十世纪的哲学领域，解释学似乎最终领得历史风骚——尽管林林种种的现代哲学流派无不风行一时，经得起历史风霜的似乎还是海德格尔推动的现象学解释学。有目共睹的是，解释学走出哲学专业领域，对整个“文化生态”和高等教育产生了远为广泛的影响。与此相应，思想史的解释成了最考验学人的哲学功夫的主要领域——“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福科、伯林、德里达等大师无不在这一领域展尽才华，其基本的信念前提便是作为现代性思想原则的历史主义。

不过，施特劳斯的《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却在1948年吹响了终结现代解释学的号角。从此，现代的文化和教育精神原则不得不面临一次深切的自我反省。各路现代-后现代哲学无不在反对近代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声称彻底澄清了哲学的根基性质——施特劳斯对色诺芬《希耶罗》的注疏性研究却让人们看到，实情并非如此，从而，我们得从头探询哲学的根基。

为什么二十世纪的种种哲学流派自以为彻底澄清了哲学的根基性质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原因很多，其中较为根本的一条是，现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在批判中推进西方的近代形而上学，而近代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则是与古典传统的决裂——站在这一决裂的起点，修习现当代哲学的业内人士大多已经忘了古代的伟大智者曾经想过些什么、写过以及如何写过些什么。盖世大哲尼采在时代的理性风潮中率先把目光转向了古希腊，然而，由于断定现代性已然无法回头，尼采始终没有去用心注疏一本古典作品，真可惜一身过硬的古典学问功夫。相反，并非古典语文学专业出身的

海德格尔却知难而为，注疏了好些希腊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的作品——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海德格尔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我们”只有重新回到古希腊的经典，才能挽救西方文明衰颓的命运。

海德格尔比谁都勤奋地要回到古希腊经典，本来是想以此抵制漫无目的的现代性，结果事与愿违，却推进而非彻底置疑了现代性，甚至结下解构主义这一怪胎，以至于“解构”之言盈天下——高等教育的文科专业以撕毁古典大书为业。为什么会有如此结果？根本原因在于，海德格尔置身于如此悖论之中：基于现代性的历史主义前提来恢复古希腊经典的地位。

由此可以理解，《论僭政》作为对源于历史主义的现代解释学的宣战书，其历史意义至深至远——绝妙且引人深思的是，这一宣战书竟是一部让大多专业古典学家哑然失语的解经书。施特劳斯同样并非古典语文学专业出身，但其一生学术专注于古希腊经典的解经远比海德格尔过之而无不及。

人们难免会不解地问：不用解释学方法，怎么解经哩？

施特劳斯并没有发明或提倡什么新的解经方法，而是致力恢复“古已有之”的解经方法——为了与现代解释学相区别，不妨称为“古典解经学”。然而，如此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观，施特劳斯名之为“古典政治哲学”。什么叫“古典解经学”，或者什么叫古典政治哲学？谁若真的有心要搞清楚这个“是什么”，最好莫过于细读《论僭政》。

反对“暴君”和“暴政”是现代自由民主的基本诉求，二十世纪的政治现实更让我们切身地感到，不能不关切现实景况；埋头读古书、做死学问，于世无补。然而，谁也不能说，施特劳斯的古典解经学远离现实生活，因为，他已经用《论僭政》这样的书名和功夫深厚扎实的经解充分表明：雅典人色诺芬对“僭政”的思考实在“太现代了”。

1967年，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左派学生会头头非要科耶夫去给

左派学生们做一次讲演——科耶夫去了，他给左派青年学生们的建议是：先学古希腊文去罢。

为什么科耶夫对意气风发、有志于在现实政治中挥斥方遒一番的热血左派青年提这样的建议——泼冷水？插科打诨？

“江山代有才人出”，每个时代都会有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因而，对于寻求良好的政治秩序来说，稀缺的并非是意气风发的个人才性，而是公共的政治美德。现代政治有一套由现代性思想建立起来的政治美德，然而，倘若不是与古希腊哲人深思过的古典政治美德作一番比较，预先就肯定现代的政治美德，对于当今政治生活来说恰恰是危险的。虽然与施特劳斯是至交，科耶夫长期坚守自己所信奉的现代的正当性原则，五十年代初，经施特劳斯激励，两位挚友就《论僭政》一书论题展开过一场公开论争，谱写下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真正堪称智慧的一页。科耶夫劝左派学生去学古希腊文，时在这场论争发生十多年以后，当时他给施特劳斯写信半开玩笑地说：“我差不多已经成了一个施特劳斯信徒”。

《论僭政》初版于1948年，那个时候，施特劳斯还是个非正牌大学的讲师（兼做一个学刊的编辑）。1954年，《论僭政》出版了法文版 *De le Tyrannie* (Paris: Gallimard)，有科耶夫的长篇评论 *Tyrannie et sagesse* ——最初以 *L' Action politique des philosophes* 为题发表在《批评》杂志 (*Critique* 41-42, 1950) ——和施特劳斯回应。其实，写评论的还有另一位名重学坛的思想大师沃格林 (Eric Voegelin)，他的评论 *Review of On Tyranny, by Leo Strauss* 发表在 *Review of Politics*, 11 (1949)，但施特劳斯的题为“重申”的回应仅简要涉及沃格林的评论（中译以及两人的相关通信，见施特劳斯/沃格林，《信仰与政治哲学》，张新樟等译，华东师大版2006），却逐点回应了科耶夫（原因很简单：沃格林不能理解施特劳斯在想和探究什么问题，施特劳斯也就不便同他多说）。后来，这篇回应的英文原文以 *Restatement to Xenophon's Hiero* 为题，作为独立的文章收入《什么是政治哲学》一书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The Free Press 1959, 页 95 - 133)。

1963年,《论僭政》出了新的英文版(布鲁姆编),收入了科耶夫的评论和施特劳斯的回应,但从法文译过来的科耶夫评论的译文很差劲。1999年,施特劳斯和科耶夫的两名学生共同编辑了一个本子,不仅重译了科耶夫的评论,还收入了现在能找到的全部施特劳斯-科耶夫通信,作为“修订-扩充本”再版——2000年,这个本子经少许修补和订正舛误重印,中译本就是据此版本逐译的。

《论僭政》是施特劳斯开拓其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的第一部力作,不仅对于他本人的学术生涯,对于二十世纪——甚至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学术史来说,都具划时代意义。但正如沃格林所说,施特劳斯的这部著作很难懂(当然也就很难译),表达“隐晦”——的确,我们需要像施特劳斯读色诺芬的《希耶罗》那样来读这部书。《论僭政》从英文译成法文难,科耶夫的评论从法文译成英文难,两者译成中文更难,何况还有那些经常讨论艰深的形而上学问题而语言却极为不规范的私人通信——我们能约请到翻译过大部头政治哲学名著的何地先生执译,实乃一大幸事;为确保质量、尽可能减少失误,找人校读完全必要,却不容易找到。观溟博士从德国弗莱堡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回国,脚还没落地,就被我拉来做校订——观溟博士十分认真,避免了不少失误,还几乎重译了相当难译的通信部分。谨此对何地教授和观溟博士深表谢意。

刘小枫

2005年9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序言和致谢

施特劳斯对色诺芬《希耶罗》的注疏性研究——《论僭政》，初版于1948年，1954年出版了法文版，除了施特劳斯的原初研究外，还包括《希耶罗》的法文译本，以及稍经编辑过的科耶夫对施特劳斯研究的重要评论，还有施特劳斯的“重述”——包含对沃格林教授的评论的简要回应及对科耶夫评论的逐点回应。1963年重新出版英文版时，基本上包括了上述法文版的内容。现在，我们有幸推出这一已成经典之作的最新版本，增加了施特劳斯与科耶夫之间现存的全部通信。

利用这次再版机会，我们订正了以前版本的各种错误并修订了译文。我们特别感谢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教授对《希耶罗》译文的细致评注。科耶夫“僭政与智慧”一文的早前译本【1963年英译本】需大改，以致实际上等于重译。

我们恢复了施特劳斯的“重述”相当重要的结论性部分——先前的法文版以及随后的美国版略去了这一部分。不幸的是，我们未能找到施特劳斯的英文原稿，只得从发表的法文版翻译过来。

我们的“导言”拟集中讨论现在这个版本提出的问题，尤其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争论。对这一讨论更广阔的背景感兴趣的读者，可在古热维奇的下列文章中找到更详尽的论述：“哲学与政治”（刊于《形而上学评论》，1968【32】：页58-84、281-328），^①“自然正当与《自然正当与历史》中的基本选择问题”（刊于《自由民主

^① 中译见刘小枫编，《驯服欲望：施特劳斯笔下的色诺芬撰述》，贺志刚、程志敏译，北京：华夏，2002。——中译编者按

的危机》一书, K. Deutsch/ W. Soffer 编辑, SUNY 出版社, 1987, 页 30 - 47),^① 以及收在罗兹的《认知与历史: 20 世纪法国对黑格尔的盗用》(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1988) 中的“承认问题: 科耶夫与历史的终结”(原刊于《历史与理论》, 1985 [24]: 页 293 - 306)。

我们不想过多介入到读者与文本之间, 因此想尽量减少编注, 除非特别标出, 这些编注都置于尖括号 < > 中。

罗兹在为写作《认知与历史》的研究过程中, 从科耶夫的文献中发现了施特劳斯的信件。科耶夫致施特劳斯的留存信件, 保存在芝加哥大学的施特劳斯档案中。我们感谢科耶夫遗产继承人 Nina Ivanoff 允许我们发表施特劳斯的信件; 感谢施特劳斯文献遗产的执行保管人 Joseph Gropsey 教授和芝加哥大学档案馆允许我们发表科耶夫的信件。我们也感谢 Laurence Berns 先生允许我们使用施特劳斯的照片, 感谢 Nina Ivanoff 允许我们使用科耶夫的照片。

古热维奇抄录、翻译和注释了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通信, 撰写了这一部分的“引言”, 本书“导言”由我们合作撰写。

V. G. , M. S. R

1990 年 6 月

^① 中译见刘小枫编,《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张新樟等译,上海:三联,2002。——中译编者按

芝加哥大学版前言

我们很高兴有这次机会再次向 Jenny Strauss Clay, George Elliot Tucker, Heinrich Meier 在抄录施特劳斯信件的早期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对 Herbert A. Arnold, Krishna R. Winston 在评论通信的译文中给予我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第一次印刷时致谢不幸被漏掉了)。

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恢复施特劳斯“重述”一文结尾部分的原样, Laurence Berns 很慷慨地把他保留的英语原件交给我们使用。

我们还改正了一些警醒的读者好意指出的打印错误, 增加了一些新的编者注释。

V. G. , M. S. R

英文版编者导言^①

最近十余年来，围绕着现代性的性质一直有一种活跃的论争。我们是否已从一个现代走向了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如果我们做出了这一转变，我们怎么评价导致这一转变的历史？或者情况是这样，这一转变的标志是否恰好是我们无能力做出这一评价？这本新版《论僭政》使我们得以回顾两个较早的有关现代性的命题：施特劳斯和科耶夫的命题。在他们关于僭政的争论文章和通信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有关哲学目前的可能与责任的基本选择。

他们两人的争论很不寻常，其范围从比较表面的政治差异一直深入到关于第一原则的基本分歧。通常，在分歧如此之深刻和激烈的情况下，几乎很少能有严肃认真的讨论，而在他们的争论中，双方理解问题的愿望要比坚持他们的立场的愿望更强。这也是他们为什么那样彻底地阐述他们命题的原因。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各种哲学或政治命题只化约为两个是不明智的，但是，这样做的确有助于把问题尖锐和明晰化。

把这些相关的文本辑到一起的好处是明显的。这样做主要的缺陷也许并不会马上显示出来：由于成为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要按它自己的主张来看施特劳斯原本的《论僭政》变得更加困难。但这一努力还是值得的。《论僭政》是对色诺芬所著的、在叙拉古的僭主希耶罗和一个智慧的诗人西蒙尼德之间的一个短篇

^① 这篇导言主要是对1990年新的英文版中所增加的“施特劳斯和科耶夫的通信”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的阐述，页码系原书页码，年月日是指该封信写作的时间。——译注

对话的仔细解读，这对话涉及到僭主的负担和如何减轻这些负担。施特劳斯是一个模范的读者，他带着尊敬和开放的心态阅读。因为，他阅读是为了学习，他的阅读又具批判眼光。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像是他的风格的了——利用文本作为展示自己智巧的材料。《论僭政》是他出版的分析一个单篇古典文本的第一本完整著作，也是他精细阅读的一个最好展示。看来，这也很适合于一篇对话，他合理地认定仔细的作者会选择对话形式来提出他们的思想，一篇对话和一篇论著之间的差异因而也是哲学入口的差异。他相应地也就密切注意对话的背景、人物和行为，就像他注意谈话一样。《论僭政》展示了一个人对一篇对话的理解如何能够被这种对其戏剧特征的注意所丰富。施特劳斯的阅读方式直接与黑格尔的观点对立，后者认为，对话的戏剧特征不过是一种装饰。两种哲学进路的差别，生动地表现在科耶夫对柏拉图的黑格尔式阅读与施特劳斯对同样对话的阅读方式的对立上。在讨论这些差异时，施特劳斯简明地叙述了他的解释原则，并继续简要、但饶有趣味地对一些对话给出了他从未书面发表过的评论。这些关于柏拉图的信始于科耶夫1957年4月11日的信，结束于施特劳斯1957年9月11日的信，它们可以结合施特劳斯对《希耶罗》的解说来有效地阅读。这些书信最富有意义的地方正在于此。

施特劳斯在《论僭政》一开始就挑战性地认为：现代政治科学对大量的政治现象如此缺乏理解，以致它甚至不知道一种最坏的僭政（暴政）是为了什么：

……当我们被带到与僭政——一种超越了过去最有力的思想家的最大胆想象的僭政——面对面时，我们的政治科学竟然不认识它。（页23、177）

鉴于“我们的政治科学”的失败，他邀请我们重新考虑古典政治哲学或科学是如何理解僭政的。这一邀请提出了古典思想如

何能恰当处理那迥异于那些它拥有直接经验的政治现象的问题。这个问题以黑格尔这一命题的真理性为前提：“哲学也就是在思想中把握的它自己的时代。”《论僭政》的一个目的就是向这一命题提出挑战。施特劳斯促请我们重新考虑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前提是：基本的问题——尤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至少原则上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可接触到。那么，“僭政也就是一种与政治生活同步的危险”（页22）。对政治生活的反省暗示着“社会将总是试图对思想实行僭政”（页27）。这样，反省僭政就导向反省思想或哲学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施特劳斯就渐渐把焦点从探讨僭政转移到探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在他看来，《希耶罗》体现了对这种关系的古典的苏格拉底式理解：西蒙尼德代表哲学生活，希耶罗代表政治生活。这样，就像理解古代僭政一样，理解现代僭政也应把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视作中心的问题。因而，当现代僭政把自己的明确特征归之于意识形态和技术时，意识形态和技术其实是现代对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的一种特殊理解的产物或副产品（页23）。施特劳斯使自己成为这种关系的古典理解的发言人，科耶夫则使自己成为这种关系的现代理解的发言人。

两人都同意，哲学与社会之间有一种紧张，并的确是一种冲突（页195、205、第27章）；他们都同意，哲学或智慧在目的的序列中地位最高，它是建构的目的或原则（《黑格尔讲演录导论》，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7年版，页303：4、95、273-275、397f、1950年9月15日）。他们的分歧在于：哲学与社会的这种冲突是否能够解决、是否应当解决？换言之，在一个充分理性的社会是否可能的问题上，他们意见不一。抉择是明显的——或者通过尽量在两者之间拉开距离来尽可能地逃避这种哲学和社会之间的冲突；或者通过致力于它们之间的和解来尽可能地解决这一冲突。施特劳斯赞成第一种选择，科耶夫赞成第二种选择。

在施特劳斯看来，这种哲学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因为社会要立足于一种共享的信任和信仰，哲学却质疑每一种信任